

現代徐霞客——丁文江（四）

徐慎緘

不能治·那就放心了

從民國二十年秋到二十三年丁文江都在北大教書，他在北平沙灘松公府，爲北大籌建了一座地質館，使北大地質系的教學設備益臻完善，時人乃稱這一段期間爲「北大地質系的黃金時代」。民國二十二年他曾代表我國出席第十六屆萬國地質學會於華盛頓及紐約，宣讀「中國石灰記及二疊記地層層位」兩篇論文。會後他重游歐洲，訪問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學，又順道赴瑞典會晤他的老友安特生，然後赴蘇聯，參觀巴庫油田，自蘇聯返國後他得了一種怪病，左脚大姆指發麻。他上北平協和醫院治療，在協和的名醫診察完畢後，醫生和病人，曾有如下一段膾炙人口的問答：

先是丁文江問醫生：

「要緊不要緊？」

「大概不要緊。」

「能治不能治？」

「不能治。」

「那就好了。」丁文江登時若無其事的，穿上衣服就走。事後，他告訴傅斯年，他這一段治病的經過，和醫生的對答。

丁文江說是

「我一聽醫生說我這個病不能治，當時就放心了。」

傅斯年不禁驚異的問：

「醫生說你的病不能治，你怎麼反倒放心了呢？」

「假如我這個病能治，那我當然就得想法子治它，」丁文江莞爾一笑的說：「醫生既然說了不能治的話，乾脆我不去想它就是了。」

丁文江出身江蘇泰興的名門望族，他家素來以周卹戚黨，樂善好施而聞名，他的高曾祖卽已在當地置有義莊。丁文江的父親丁吉菴，一年到頭都在爲地方公益，排難解紛而忙碌緊張。小孩子的教養全部交由丁文江的母親單太夫人負責。丁

文江共有七兄弟，同母的兄一弟二，異母的小弟第三個，大致從他異母弟老四以上，一應求學費用完全由他負擔，因此朋友們常說他小家庭開銷小，大家庭開銷大，肩頭上的担子是很沉重的。據他的弟弟爲他算的賬，從丁文江二十六歲到四十六歲爲止，他曾先後負擔過下列四項開支：

- 一、每年給他舅舅五百元的生活費。
- 二、收入不丰的兄弟每人每年津貼三百元。
- 三、四個弟弟，一個侄兒從小學到大學、留學的全部教育費用。
- 四、大家庭中任何一人的意外遭遇開支。

由而可知整個大家庭的重心，和經濟重壓全加在他一個人的身上，以一位學人勞心勞力之所得，應付這麼大的開銷，居然能够一輩子不負債，實在是個奇跡。北伐以後丁文江失業的那一年，傅斯年曾經很關心的問起他的經濟狀況，問他：

「你小家庭外，大家庭內，連同接濟親戚，你一共得負擔多少錢？」

丁文江的回答是：

「今年兩千。」

那還是指他全無收入的失業期間而言。

丁文江的小家庭，除了疾病的陰影，始終過得幸福而平靜，他和他的夫人史久元，思想和生活習慣，都有相當的距離，但是他對他夫人的溫存體貼，恩恩愛愛，傅斯年說即令是少年恩愛夫妻，也不過如此。史久元婚後二十多年，不斷的在生病，而丁文江也就侍候了她二十多年的病，他是她的保護者兼看護生，使他的朋友交口讚譽他是一位模範丈夫。

但是這位模範丈夫談起男女間的性關係來，他却並不反對「自由戀愛」、「自由生活」，他主張人的「性本能」應導之於正，莫失却一個人的精神平衡，不妨礙到他的「用處」和本業，祇要在這個大前提下，戀愛固可，連娶妾也未必有害。當徐志摩和陸小曼陷於畸戀，丁文江曾經表示反對。不過他聲明他之所以反對是由於徐陸結婚以後，徐志摩就無法工作。

民國二十一年春，朱家驊出任教育部長，一度有意聘丁文江為中央大學校長，不得結果而罷。二十三年夏，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猝卒，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子民）首先提名丁文江繼任。可是，當時持反對意見的人，仍然相當的多，甚至有「丁文江是超科學家」的諷詞。不過蔡元培一力堅持，朱家驊也大為贊成，學術文化界人士對他具有好感的，亦復不少。丁文江自己則在接到聘約之初，頗費躊躇。他所担心的不是嫉妬者的流言中傷，百計阻撓，而是考

慮自己的健康與體力，能否勝任？丁文江在死前十年，有一句經常掛嘴邊的話，他總是憂鬱的說：

「我不會活過五十歲，因為我父系三代，都沒有活過這個大限的。」

這話後來到是他不幸而言中了。他正好死在四十九歲頭上。

當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到中央研究院赴任之前，丁文江曾去協和醫院，作了一次很澈底的體格健康，結論是他的健康並無問題，他這才欣然的全家搬到燕京，就任新職。從二十三年七月到二十四年十二月，他一共當了一年半的總幹事。就任之初，他就宣示他的辦事原則。第一、他要求分工合作。第二、他認為唯有科學的智識才是真知識，而真知識之取得，應該具備下列兩項條件：

- 一、由一羣受過實際訓練的人做基礎工作。
- 二、以一個健全的組織，作為神經中樞，負起安排調度的責任。

此外，還有一項更重要的原則，那便是——他說中國既然是一個窮國家，那麼，無論根據什麼理由，只要浪費金錢就是罪惡。

丁文江對於中央研究院所作的最大貢獻，厥為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七日由他一手建立的評議會，胡適曾稱此一貢獻：「使這個全國最大的科學研究機構，重新建立在一個合理而持久的基礎之上。」往後也當過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朱家驊也說：

「評議會的成立，是在君先生替中央研究院立下了百年大計。有了評議會，才有後來的院士會議，有了院士會議，研究院的體制才正式完成，這是我們同仁所深深感謝的。」

民國二十四年底，丁文江應國民政府鐵道部之邀，到粵漢鐵路兩側勘察湖南的煤礦，同時他也想去看看幾所有名的學校。二十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他抵達長沙，當時朱經農在當湖南教育廳長，他怕長沙的旅館嘈雜，特地在省府招待所為他預備房間，不曾想到，當夜在長沙火車站一接到丁文江，就碰了他一個釘子，丁文江連連搖頭的說：

「我這次到湖南來，領得有公家的旅費，不應該再打擾地方政府。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自己住棧房，使我自己心安。」

這個場面相當的窘，經過往迎的人員再三勸說，又因為夜已深了。丁文江方始應允，姑且在招待所暫住一夜，明天一早，再找旅館。

那曉得一進省府招待所，就遇見青島大學校長楊今甫，他告訴了丁文江，他和陳通伯來湘，也在招待所住，覺得十分清靜，陳通伯先一日動身回了武昌，但是楊今甫說：「只要丁文江答應住下，另一位朋友清華大學教授張子高一定搬來。他鄉遇故知，正好客中盤桓，丁文江終於安心的住了。」

深夜方到，第二天一早八點鐘就開始工作，邀來湖南地質調查所的同仁，攤開湖南各地煤礦的藍圖，研究討論，九點多鐘朱經農來邀他同往參觀明德中學，看見這種情形覺得不便打攪，還

退到楊今甫的房裏去等了一個鐘頭。

丁文江告訴朱經農，他這次到湖南一定要見到兩個人。其一是曾經勸他助他留學的前泰興知縣龍研仙的夫人，其二是明德中學校長胡子靖，當年他以十四歲的少年東渡日本，便是胡子靖帶他同去的。然而他這兩個願望居然都失之交臂，未曾達到。說來也是非常的「不巧」。

十二月三日朱經農特地陪丁文江參觀明德，目的就在訪胡子靖，可是偏巧胡子靖因事外出，不在學校。五日一早他正要赴南嶽衡山，調查地質，並且順道訪謁他的師母龍研仙夫人，胡子靖命人送了封信來，邀他再赴明德演講，並且還要請他吃飯。丁文江啓程在即，只好匆匆的寫了個便條回復，中有佳句云：

「講演肚裏空，吃飯肚裏實。」
但是他仍然約定在同長沙後，將「再度詣校，俾把臂長談。」

五日中午抵達南嶽衡山，僱了三乘轎子，朱經農、張子高乘轎，丁文江則徒步攀援，一路觀察岩石，測量氣候，他們曾到烈光亭瞻仰龍研仙的紀念碑，並且徘徊良久，丁感慨歎歎的說起龍研仙對他的知遇培養之恩，當夜宿於半山亭下的中國旅行社新屋，他還作了兩首「烈光亭懷先師龍研仙先生」，原詩如下：

十五初來拜我師，爲文試論西南夷；半生走遍滇緬路，暗示當年不自知。

海外歸來初入湘，長沙拜謁再登堂，回首廿五年前事，天柱峯前淚滿腔。

詩不太好，但見其真情流露，不盡低徊而已

如何中毒 彷彿是謎

六日再登南天門，繼續截測，七日清晨乘粵漢鐵路局派來的汽車，前往潭家山探礦，朱經農、張子高先回長沙。丁文江八日再乘原車到衡陽，當晚渡江到粵漢鐵路局長凌鴻勳的家：苗圃嘉樹軒。丁文江和凌鴻勳在民國十一年時即已結識於北京，丁文江任淞滬商埠總辦，凌鴻勳正當交通大學校長。兩個人是時相過從的多年老友，重晤之餘倍感欣幸。凌鴻勳尤因丁文江的惠然肯來感到興奮，他們相對若談，從湖南的煤礦談到國家大事，丁文江認爲他們那一輩的壯年學者亟應以有自奮，趁此盛壯之年急起苦幹，爲國家建事業，爲後學樹楷模。但是他又感慨歲月蹉跎，新猷未能多展，言次頗有些責備賢者之意。凌鴻勳當時就有點詫異，因爲他發覺丁文江談鋒之健，與乎塊磊之傾吐，爲他們結識以後從未有者。

那天晚上丁文江在凌鴻勳家吃飯，飯後，又談到九點鐘，方由凌鴻勳親自送他到粵漢鐵路局招待所，這一送，就將丁文江送進了鬼門關。

招待所房間很小，裝得有一座壁爐，丁文江進招待所後先洗澡，浴罷回房，一生注重科學，曾有「超科學家」之稱的丁文江，居然會作了番違反常理的安排，委實令人不可思議。他那個小房間裏的壁爐，是先一天下午就生好了火的，煤火已經燒了一個半白天帶一夜，房間裏自然不乏煤氣，但是他却竟在臨睡之前，吩咐侍役多添煤

火，再把窗門緊閉。

照丁文江的胞弟丁文淵，亦即丁文江所指定的遺囑執行人，他往後的說法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不得其解。丁文淵說：

……曾下礦視察，出汗很多，回寓沐浴，待役無知，在一個已經閉塞的壁爐內生火取暖，因此中了煤毒！又爲一個無知的鐵路醫官，急於見功，不問好歹的施行橫蠻的人工呼吸，致將他的肋骨弄斷。當時病人已無知覺，所以沒有發現。當天翁詠寬奉命乘了蔣先生的私人飛機到衡陽去看他。至今不能理解的，翁先生沒有用飛機將他順便帶回南京，而讓他用卡車送往長沙湘雅醫院去休養。很負時譽的楊濟時醫師，竟大意的沒有仔細檢查，根本沒有發覺肋骨的斷折。到十二月中旬（陰曆）傅孟眞（斯年）奇異他還沒有恢復，趕到長沙去看他，他說肋骨常痛，孟眞另請一英國醫師診視，才診斷出他的肋骨已經因傷生膿，結成了膿胸。因爲時間太久，雖然開刀了兩次，仍然無效，到二十五年一月五日竟不治而死。」

那位「很負時譽」的楊濟時醫師，正是長沙湘雅醫院的內科主任，他曾爲丁文江之死作了一份將近兩千言的「治療經過報告」，原文登在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一八九號。此外則該刊又登有鍾伯謙的一篇短文「丁文江先生考察湖南湘潭譚家山潭昭煤礦公司情形」，證實他曾在中毒之前一日，確曾下礦視察，就是沒有提起他曾出了一身大汗。而鍾伯謙這篇文章，係奉朱經農之囑寫的。

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那夜，丁文江因爲他到

長沙後一連三夜都失眠，八日睡前照例服食一粒珂達令安眠藥，然後就熄燈就寢。十二月九日早上七點多鐘，粵漢路株韶段路局的同仁和招待所兩位住客在進早餐，偏是丁文江沒有起床。路局中人曉得他和凌鴻勛約好了是晨偕往耒陽。於是有人命丁文江的僕從進屋去看看，因為丁文江的房門並未下鍵，從僕推門而入，看見丁文江正熟睡未醒，他喊幾聲，不問回應，再搖撼他的手臂，丁文江却彷彿毫無知覺，楊濟時的報告書中說：「經該從人十分鐘之呼喚不醒，因疑有異，即請路局陳醫師前來診視，此為九日晨八時左右事。」但是凌鴻勛在他的「悼丁在君先生」一文中則謂：「九日晨七時半余扣先生戶知尚未起，其僕謂久撼而未醒也。室中有壁爐，曾於先一日下午生火，先生（指丁文江）睡時將所有氣窗關閉，於是同人決為中毒。立召鐵路陳、袁二醫生至，時呼吸仍有，而脈已微。急施救治，不見醒轉，旋察其枕下還有安眠藥少去三片，因決係夜睡過熟致中毒不覺。因一面召教會仁濟醫院美人布醫生，一面電囑朱經農兄覓一良醫來衡。是日午間由公寓移往仁濟醫院，是夜湘雅楊濟時醫生至。但至十日上午仍未見醒，余乃急電詢翁詠寬先生，而在君先生於十日即已醒轉。翌日翁詠寬先生偕醫生至，在君先生已能言語，盡憶前事，相與大慰，以衡地醫院設備不週，因商定稍俟即移往長沙湘雅『休養』。十五日先生身體大有進步，湘雅醫生復來，以為正宜移居湘雅。因由楊醫生與鐵路陳醫生陪同先生赴長。余以工務逼迫，於先生赴長之翌日即南下勘工。旋得湘雅楊濟時醫生謂

：『丁先生病狀大有起色，肺部經用X光檢查甚為健全。數日之後，即可就愈云云，為之大慰。詎意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起牽動舊恙，情形惡化，一月五日竟爾不起！余自別先生後即由粵赴京，迨余復由京至粵之日，正先生彌留之際，竟未及再與先生一面，嗚呼，傷已。』

再看朱經農的說法：

朱經農說得很詳細

「七日清晨，在君乘粵漢路局派來之汽車赴譚家山勘礦，予高與我同回長沙，他在譚家山勘礦的情形我不太清楚，無法記載。只曉得他八日乘車赴衡陽，當晚渡江在凌竹銘（鴻勛）先生家裏晚餐，聚談甚歡。因為江東無旅館，所以凌先生留他在路局招待所過夜。約定次日上午八時赴耒陽勘礦。是晚烈風驟雨，溫度陡降。在君先生登山、下礦之後，身體倦極，非常畏寒。故將室內門窗全閉，沐浴入寢，倒頭便睡。誰知風雨過猛，壁爐中煤烟不能上升，倒灌室內，遂致中毒。（似乎是入情入理，也比較科學點的說法。）九日清晨，僕人入室呼在君先生不醒，見其呼吸急促，面色異常。乃邀路局陳醫生來診，始知係中煤毒。醫生三人輪流施人工呼吸，歷五小時半，未見清醒。乃用鐵床，將在君先生載運過江，送入仁濟醫院救治，一面由凌竹銘先生用電報及長途電話，託我在長沙延醫往救。」

朱經農又追憶的說：

「九日上午，我尚接到在君先生來電，謂定

十日返長沙，即日轉車回京，因都中另有要事，議其速歸。故變更原定旅程。該電係八日晚間預撥，託人代發。所以下午四時由建設廳轉來電話，謂在君病重，尚覺疑信參半。五時左右，接到竹銘長電，才知在君中煤毒，歷久不醒。立即用電話與湘雅醫院商量，承王院長特別幫忙，允請內科主任楊濟時大夫即刻赴衡。當時湘中正在匪警，公路局汽車正派出當差，一時無車可借。迫不得已乃向財政廳何孟吾（浩若）先生公館借其私人所用之車。其時何先生不在長沙，他的汽車夫經驗不足，不敢開夜車，所以車雖借得，無人駕駛，依然不能出發。後來還是建設廳余劍秋廳長在公路局調到一車，將楊濟時送往衡陽，直至深夜，方才到達。其時在君先生依然不省人事，當地醫生認為希望極少，經楊濟時詳加檢驗，知體內水份已竭，血液凝滯。乃於次晨注射多量鹽水，並灌葡萄糖汁，以維其體力，直至十日晚間開始有轉機，十一日上午四時漸漸清醒過來。」

朱經農不憚其詳的繼續往下說道：

「十一日上午翁詠寬（文瀨）、丁巽甫諸先生偕在君先生第七令弟乘飛機來長沙，隨即換乘汽車前往衡陽，我亦隨行。抵衡陽時天色已晚，於暮靄蒼茫，萬家燈火中，入城赴醫院，探視在君先生病狀。既至榻前，彼（指丁文江）即低呼經農，聲極微弱，不易辨明。問其有無痛苦？微呻而已。當九日下午楊濟時未到以前，衡陽各醫師用器械，阻其牙關緊閉，並拔去牙齒三顆，口腔喉頭均被擦破，至此漸覺清楚。」——十二日清晨再往探視，則在君先生神志清醒，言語時聲

音雖小，但有條理，因恐其過於費力，未敢多談。與翁詠寬先生同來之南京中央醫院內科主任戚壽南大夫，詳加檢驗之後，認為經過良好。在君先生亦強作笑容，以慰來衡問疾之人。自朝至夕，病情頗有進步。」

朱經農於焉又說：

「十三日黎明，翁詠寬先生等離衡返京，戚大夫及我亦同行，在君先生病狀似漸入佳境。十五日楊濟時大夫復由長沙赴衡，與衡城醫生會議之後，決定將在君先生遷往長沙。因為衡陽方面，醫院設備不甚完全，且少訓練有素之護士，故覺遷往湘雅，療治稍易。承凌竹銘（鴻勛）先生及衡陽路局諸友好竭力幫忙，將路局大貨車改裝成病車，連床載運來省（省垣長沙），直達湘雅醫院。楊醫生及路局陳醫生、夏主任等均隨車護送至長沙。入院以後，情形甚好。用X光檢驗，發現心肺諸部均未受傷。復經辜樂懿女醫師診治，口腔及喉管亦平復如常。惟滿身疼痛，胸前尤甚。十七日以後，溫度脈博均漸復常態。不久傅孟真（斯年）先生由北平來湘探病，丁夫人及在君之第五令弟（文治）亦由南京趕到。親朋歡聚，病者精神為之一振。至二十二日下午，在君強欲起床，且言明日必須自入浴室沐浴一次，醫者不許。二十三日上午，得醫生許可，經人扶掖至椅上小坐。一小時後覺胸前痛苦陡增，不能支持，乃復上床靜臥。午後體溫增高，至二十四日溫度續增四十度左右。經外科主任辜仁醫生（Dr. Green）檢驗，發現胸間有膿。日間灌輸氧氣，以減少其呼吸的困難，當晚施用手術，取出膿水五百

〇〇之多，次日復取出膿水少許，溫度脈博又漸復常態。是日我至牀前，設法安慰在君，告以膿已取出，病根既去，必日見康復。他搖着頭說：「你的判斷不合科學。」

朱經農的這一段敘述，說明了兩點最重要的事實，那便是：第一，丁文江在他臨死的前幾天，早已獲知他終將不起。第二，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他總以「科學」為第一要則。

翁文灝對得起他麼？

丁文江在極端痛苦中經過胸部穿刺手術，終於發現胸腔裏有淡紅色的膿液，從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他又度陷於神志不清，二十九，北京協和醫院的外科主任費克斯（Dr. Locks）替他開刀，查明白了他第五肋骨折斷，胸腔中的膿液裏又有了肺炎雙球菌，祇好給他留下一個二寸寬的出膿管，這時丁文江已在彌留狀態，用「救治失時，羣醫束手」，斯為最正確的寫照，他一直拖到元月五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溘然長逝。

死後，醫方診斷他的死因，一共有六項之多。是為：一、一氧化碳中毒。二、左胸第五肋骨骨折。三、枝氣管發炎。四、左胸積膿（肺炎雙球菌）。五、心臟衰退。六、腦中樞瘀斑出血。從以上所列舉諸人的敘述，與這個診斷中可以看出，丁文淵對於翁文灝之未能利用今總統蔣公所派的專機，送丁文江赴南京急救，以及那位「無知的鐵路醫官」，施行「橫蠻的人工呼吸」，致將丁文江的肋骨弄斷，還有楊濟時大夫的未能

發現肋骨斷折，所作的抗議與指責，的確並非無的放矢。因此，丁文江也就可以說是在人謀不臧的情形之下，錯中生錯，被誤死了的。

丁文江果然在四十九歲那年死了，英年溘逝，聞者傷悼。當時有人覺得奇怪，像他那麼一個精神抖擻，新鮮活跳的科學工作者，怎麼會中煤毒？難道他聞不到煤味？還是在聞到了以後無法掙扎得出？這個疑問，一年後由他的弟媳丁張紫珊洩露了一項祕密，同時也提供了令人滿意的答案，原來，丁文江的嗅覺從小就有毛病，後來他還在上海撞過一次火車，傷處，正好又在鼻子上。加以當晚他吃了安眠藥，他是在熟睡裏中了毒的

早在二十四年三月七日，丁文江預先立好了遺囑，指定以他身故之地為葬所，所佔墓地不得超過半畝，棺木應在一百元以下，還不許親屬開吊、發訃聞、唸經，「或徇其他糜費無益之習尚」——假使他身故之地有火葬設備，他希望能够火化，同時，由於丁文江夫人無出，他在遺囑中特別聲明不得為他立嗣，丁文江說：「因為，現行法已廢除宗祧繼承」了。

至於遺產，丁文江在永明公司保了兩千英鎊的險，這筆錢，再加上中央研究院的卹金，丁文江指定給他的夫人作生活費，此外他有八種股票，一共賣了一萬七千另七十元，則按照他的遺囑，分為八份，贈給他的六位兄弟。

遺著出版一拖十年

丁文江逝世之前，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七日，

國民黨舉行五中全會，推選今總統蔣公爲行政院長，蔣公對丁文江的才華十分賞識，曾經破格邀他出任鐵道部長，明令即將發表，而丁文江已中毒誤死，所以當噩耗傳抵首都，蔣公至表震悼，中央研究院爲丁文江舉行追悼會，蔣公會首先到會致祭。會中胡適和翁文灝都曾致追悼詞，胡適特別提起丁文江生前常說的自嘲之語：「我們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翁文灝則繼述丁文江運用古生物學在調查中國地質上的貢獻，那天他非常的傷感，才說了三句話立刻就扁嘴、紅眼、開始嗚咽啜泣起來了。本來嘛，翁文灝自民國三年在北平與丁文江結識，他一直是丁文江的老搭檔，當時翁文灝在地質研究所擔任主任教授，正苦於找不到人教古生物學，和丁文江談起，他當下就慨然應允，成爲我國教古生物學的第一人，五年地質調查所正式成立，丁文江當首任所長，翁文灝主持礦產股，這兩位在地質工作上向來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照說他們的友誼應該格外的真摯密切，不過拿「生死交情」的角度來看，則無人不認爲丁文江待翁文灝至厚，二十三年二月翁文灝在浙江武康車撞橋樑，受了重傷，當時丁文江正臥病協和醫院，朋友們設法瞞住他這個消息，偏偏給他報上聞及，丁文江馬上就要出院飛往杭州探視，醫生率直拒絕，他竟涕淚交流的跟醫生爭執，後來醫生高聲的說：

「你在這個時候離開醫院去坐車是極優的事！即使你到得了杭州，你還是一個病人，對於你的朋友，又有什麼用處？」

丁文江想了想，終於又回了病房，自此，他

便在病牀上料理翁文灝的許多事，而且一天到晚都在喃喃自語的說：

「詠寬這樣一個人才，是死不得的！」

他還爲翁文灝扶病寫了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翁詠寬」，據翁文灝往後自承的說：

「丁在君先生在獨立評論發表『我所知道的翁詠寬』，差不多是一篇身後的墓誌銘。不料時未兩年，我猶健在，而在君先生竟已長逝，還是我在此地寫他死後的追憶！」

翁文灝又曾說過：

「我與在君先生相從二十餘年，承他待我爲友，我心中實敬他爲師。」

然而丁文江死後，翁文灝却難免丁氏家屬對他頗有微詞，例如丁文江的四弟丁文淵，除了指責翁文灝「沒有用蔣先生的私人飛機順便帶他回南京之外，他還公開指出，他是丁文江遺囑中指定的執行人，並且由丁文江指名要他整理他生前的遺著。但當丁文淵由德國聞耗返國，三月間回到丁文江的南京寓所後，已經找不到丁文江的任何遺著。據家人說，丁文江所有的著作都被翁文灝拿走了。丁文淵詰問翁文灝時，翁文灝的答覆

竟是：

「你老兄並沒有什麼遺著，在我這裏的，只有他在雲、貴、川三省調查的報告。這是一部專門著作，又不是你所能懂的，還是讓我替他整理代印吧！」

然而這一整理，居然是將近十年，從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直到三十四年間，始終不得這一部報告付印出版的消息，而丁文江在此中的若干理論，則早已爲地質界人士所引用。丁文淵和李仲揆曾再三催促，翁文灝方於抗戰勝利後，交出這一部書的原稿，由中央地質調查所代爲出版。

英國哲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來華訪問時，中國學術界推由丁文江擔任總招待，羅素在英國向有「民衆聖人」之稱，而他却又是貴族出身。因此，曾有一次，丁文江向羅素說：

「羅素先生，你乃真正的是由英國貴族產生的清品。」

羅素返國後，也曾向其國人公開揄揚丁文江，作爲回敬，他說：

贈

贈與中外雜誌讀者的親戚、朋友、同學、試閱。請附郵票拾元，寫明收書

人地址、姓名、由本社代寄本雜誌第九卷第三期特大號再版本一冊。每人限贈兩冊。

贈書

贈與中外雜誌讀者。請附郵票四元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由本社寄贈黃正銘教授著戰時國際公法一冊。